

## 自序

這本為《今天》編輯的專輯終於要出單行本了。

今年初春，我離開有些寒冷的北京，經多哈，往約翰內斯堡。這是我的第三次非洲之旅了。行前，北島幾次電話，都是督促我儘快完成為《今天》所做的專輯。按他的說法，專輯的目的，是以作者個人的經歷和思想軌迹，以小見大，呈現時代的變遷。雖然我按期收到寄來的《今天》雜誌，但大約是為了給我一點編專輯的啓發，也為了給我一點壓力，北島不惜重複地將新出版的張承志專輯、徐冰專輯、李零專輯和韓少功專輯一一送給我。從一年前說定編輯這份專輯起，他的督促電話就沒有斷過。這些已經出版的專輯如此精彩，真讓我難以着手。去年夏秋之間，我將自己的舊作統統交給編輯經驗豐富的何吉賢，拜託他從這些舊文稿中選擇若干，按照《今天》的要求，編成專輯的模樣。吉賢慨然應允，給了我很大的鼓舞。

但北島說：至少有一篇必須是沒有發表過的作品。這篇作品便是收錄在文末的〈紀念碑的限度，或真知的開始〉一文。至少有兩年吧，文章初稿一直存在我的電腦裏。這次登機之前，我匆忙將一些相關資料隨身帶上，在往南非的航程中，開始修訂和增補。借着微露的舷窗透出的天光，我一路沉浸在15年前的舊事中，不覺間已經飛越亞洲和海灣地區，到了另一個大陸。在約翰內斯堡期間，除了幾次演講和交流之外，便是四處訪問，從約翰內斯堡到索

維托，到處都是種族隔離的遺迹和反抗鬥爭的紀念碑，歷史的一頁似乎翻過去了，但新的排外浪潮讓人覺得翻過去的那一頁依舊停半空，彷彿隨時復燃的死火。在憲法山（Constitution Hill），我躑躅於關押甘地和曼德拉的囚房，思考紀念碑的意義。夜晚歸來，滿天的星斗，除了臨近街上的酒吧裏偶爾傳來喧嘩的人聲，街道寂靜無人。我偶爾想，若是在這兒，而不是在往返柏林和北京之間的旅途之中，起筆寫這篇關於猶太人的故事，感覺或視野或許都會有所不同。可惜交稿在即，我已經來不及將自己在非洲的所感組織在寫作之中了。

學術生活大多沉悶乏味，即便自覺有趣，要想感染別人實在是很難的；沉浸其中，往往被問題牽着走，下筆枯燥，不能顧及文辭。我偶爾寫點隨筆性質的東西，多半因事而起。一是紀念逝者，感懷舊事；一是完成新作，草成序跋；一是行旅之中，記下一點痕迹。筆端忽而有了感情，文字有所靈動，多半與此有關。平居時期，沉潛於研究工作；遠遊的時候，閱讀、觀看、交往的對象都有所不同，連早已遺忘的人與事，點點滴滴，浮雕一般，降臨在遠離家鄉的夜晚，窗前燈下，或者黑暗之中，與我相伴。記得第一次去非洲的熱帶雨林和大草原，叢莽和森林之間，危機四伏：尼羅河中鱷魚河馬，森林之中封豕長蛇，叢莽草原獅豹象牛，即便是豺狗，也是招惹不起的。我彷彿覺得自己身體裏的自然被第一次喚起，那種遏制不住的亢奮，連帶着原始的恐懼，讓人晝夜不眠。我忽而覺得，那是我初生時的感覺，是在成長中被不斷剔除的能量。初

生時連記憶也尚未出現，但這些感覺卻蟄伏於身體的最深處，難以察覺。在森林草舍的昏黃燈下，我展筆記錄未曾經歷的感覺，如此分明，卻無從着筆。這是遠遊的成果，因脫離生活的常軌而產生的記憶和回想。漸漸地，我開始習慣這種周而復始的狀態，甚至習慣攜着書本負重旅行，在別處進入寫作。除了查找資料等研究工作外，由旅行而創造的距離，對於思考——包括對於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的反思——而言，似乎也有意義。

1996至2007年，前後11年半的時間，我應董秀玉之邀，擔任《讀書》的編輯，也因此陸陸續續寫下了許多「編輯手記」。這是我寫作生涯中的「例外狀態」。早幾年，曾經有出版社來聯繫黃平和我，希望將我們陸續寫下的文字單獨成冊，我們也為此做過討論，但終因各自奔忙於新的工作而無暇顧及，一再耽擱，怕是連邀請我們的編輯也已忘卻了吧。編輯工作如流水，日日奔湧不息，每月一篇，多半在發排的前一夜才能倉促成篇。手記篇幅短小，內容不一，謀篇布局、講求文辭都是從容的產物，而我們的手記多半因應正在發生的變化，一星半點，急就章而已，唯有折射時代的氛圍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。我們編輯《讀書》的十餘年，不但中國和世界發生着巨變，而且我們自己、我們身處的所謂知識界，也日日分化組合、糾纏搏鬥，曾被人譏為「杯水風波」的思想爭論，竟然演變為全國性的軒然大波，恐怕並不是幾個文人的不安本分使然。我們所寫的「編輯手記」多半因時因事而起，限於周遭的氛圍和編輯的身份，或喜或悲或怒或諷，都不能像普通作者一般傾瀉

而下，總是有所節制，力求客觀，即便暗含褒貶，偶爾推敲修辭，多半起於顧忌而非炫耀文字。其實，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所謂怨而不怒、哀而不傷、婉而多諷，在其初期，恐怕不是出於辭章之講究，而是情境使然，久而久之，卻成為一種審美的習慣。我達不到這樣的境界，難免氣急敗壞，但身為編輯，不得不時時克制自己，不知不覺間，也會有所謂「曲筆」。無論如何，留下幾篇手記，錄此存照，算作一段證言，也還合適。這次出版專輯，吉賢特意選出一些「編輯手記」編成一組，在文體上也算別具一格。

對於文章及其體式，我一向信奉曹丕的說法：「夫文，本同而末異，蓋奏議宜雅。書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，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，唯通才能備其體。」（《典論·論文》）我喜歡邏輯嚴密、史料詳備的文字，對於搖曳多姿的文辭，雖有閱讀的雅興，卻很少入勝的感覺。作為編輯，對於圓通簡練、靜穆幽遠的作品是不能忽略的，但我得坦承自己最重視的仍然是洞見和新意，以及在這洞見和新意中呈現的作者的胸襟、品質、情懷和世界觀。就文字言，讀所謂學者散文，多半不及讀詩人、文學家的文章有趣；現在居然將這些「閑筆」結集成冊，並在《今天》出版，惶惑之感，在所難免。但是，相比於研究性的作品，在我的寫作中，這些文字或多或少可以呈現一個如我一般的行者所走過的道路，透露思考和研究過程中的一些動機或契機。這或許也就是《今天》編輯出版這套專輯的用意所在。想到這一點，心也就漸漸地沉靜下來，連窗外貢多拉船夫的歌聲也聽得分明了。

2015年4月19日於威尼斯